

明德
编著

与火的斗争

《新华日报》营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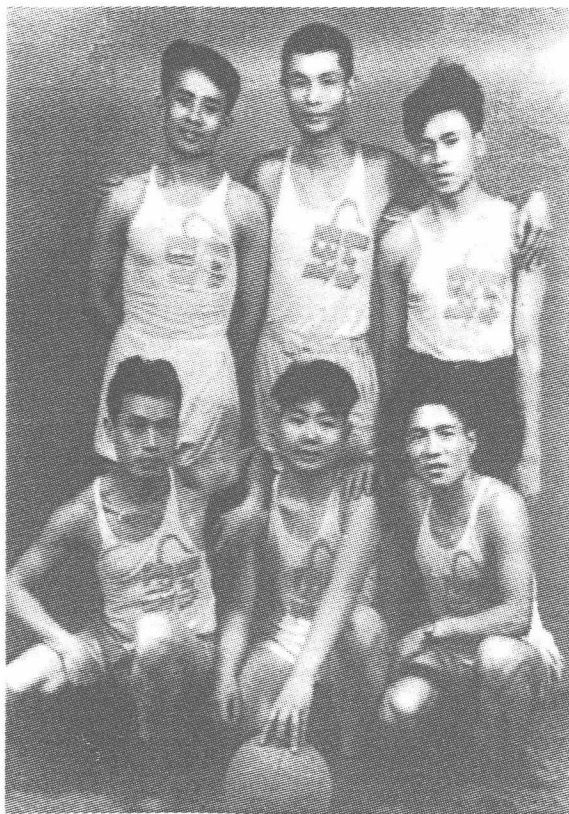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明德 编著

血与火的斗争

——《新华日报》编辑部

营业部同志在义卖



营业部篮球队
后排左起：王孙静、
罗石生、戴宗奎
前排左起：胡国基、
刘业富、刘忠

前言

《新华日报》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光辉的战斗历程和不朽的历史功绩。

《新华日报》组织机构分经理室、编辑部、印刷部和营业部，而营业部是这四大劲旅之一，它们并驾齐驱，共同奋进。经理室是管理机构；编辑部是中枢神经；印刷部是造货中心；营业部则是尖兵，它是联结报纸与读者群众的主要纽带。

营业部史是《新华日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显现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就不能孤立和单纯地去写其经营管理、报纸图书发行销售及营业状况，而必须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去记述，即既要求在这篇历史论著中充分洋溢着同仇敌忾的抗日壮烈激情，又要如实地反映国共两党之间又团结又斗争的政治局面。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去写，才能表现它的历史本来风貌。

此书编写以时间为序，务重史实，分上、中、下三篇，反映、总结《新华日报》营业部在经营管理和发行工作中的历史经验，以及实录发行工作中在国民党当局封锁下我们进行反封

锁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情景。

书稿编写前,史学会领导林曦、王匡时等同志参与指导,就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调查研究、如何整理成篇,均提了意见,并决定何鸿钧、邹光海、左明德三人组成编写组,由左明德执笔写成初稿。编写组还去北京访问了杨放之(吴敏)、于刚(生前)、孙敬文(生前)等老领导;在北京开了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忠、管佑民、张耀秋、周孟健、冯廷雄、李少逵、左明德、邹光海等。郑心如、罗戈东、卢杰、刘忠、钟纪民、黄光武、徐立人等同志在收到调查提纲后,及时写信提出了编写书稿的一些意见,同时附来了珍贵的回忆资料。左明德在执笔编写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初稿是三易其稿而形成的,经何、邹两同志初步修改后打印成册,发送给各地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再根据反馈意见,反复修改,完成定稿。

对关心和支持营业部纪事编写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重庆出版社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致以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1)
----	-----

上 篇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1938年1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

一、《新华日报》的诞生及其宗旨	(1)
二、党中央重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	(2)
三、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及其营业部	(3)
四、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4)
五、各地分馆分销处的建立及其发行网点	(5)
六、扩大发行工作的重要举措——组织读者会	(9)
七、重视《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11)
八、《新华日报》早期的广告栏目	(14)
九、《新群丛书》的出版发行	(16)
十、既从容又繁忙筹划迁移重庆	(17)
十一、血染长江的悲壮史——新升降事件	(21)

十二、在武汉坚持出版发行到最后一期·····	(24)
------------------------	------

中 篇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1938年10月—1945年8月)

一、《新华日报》营业部组织新队伍迎接新任务·····	(26)
二、报纸发行工作由平静转向被限制阻挠·····	(30)
三、发行工作遭受的迫害与反迫害斗争·····	(40)
四、组织报丁报童队伍,作党报发行的生力军·····	(51)
五、突破封锁是发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61)
六、突破外埠封锁更艰难·····	(65)
七、北碚、歌乐山发行站始末·····	(69)
(一)北碚发行站的始末·····	(69)
(二)歌乐山发行站的始末·····	(74)
(三)特务机关对北碚、歌乐山发行站的破坏·····	(76)
八、国民党军统中统等机关对《新华日报》发行工作的监视 ·····	(80)
九、《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图书课及其门市部·····	(84)
(一)门市部之书刊首次遭到图审员的没收·····	(84)
(二)国民党当局对图书出版的种种限制·····	(88)
(三)门市部是摧不垮的书刊发行阵地·····	(93)
(四)门市部发行了哪些书刊·····	(96)
(五)热诚为读者服务是门市部的宗旨·····	(100)
(六)团结进步同业同舟共济·····	(102)

(七)图书课门市部的几件离奇斗争·····	(104)
十、在极端困难中奋进的广告课·····	(114)
十一、不平凡的事务课工作·····	(124)
(一)营业部的事务工作·····	(125)
(二)统战工作的哨兵·····	(128)
十二、毛泽东同志看望营业部工作人员·····	(130)

下 篇

解放战争初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1945年9月—1947年2月)

一、解放战争初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134)
二、“二二二”血案及其经过·····	(136)
三、在一场闹剧官司后,更加紧迫害报纸的发行·····	(144)
四、新华日报及营业部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	(149)
五、党组织在营业部所起的战斗堡垒作用·····	(157)
六、昆明、成都两地的营业分处和北碚发行站被迫撤退 的概况·····	(163)
七、结束语·····	(174)
附录:营业部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名录·····	(176)

上 篇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1938年1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

一、《新华日报》的诞生及其宗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在这期间,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意旨,要求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蒋介石表示“所谈甚好,完全同意。”从而《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大后方)取得了公开出版发行的合法权利,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了。

《新华日报》创刊时,即在发刊词中公开了其办报宗旨:“本报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史迹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

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出版和发行，标志着我党在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党中央重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

党中央对《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非常重视。1938年4月2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的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创办全国性报纸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学习党的报刊，并指示各地方党组织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新华日报》，以期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尽可能订一份《新华日报》并帮助推销发行。这个指示表明了党中央对《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的高度重视。

因为再好的宣传品，如果不发行到广大群众中去，是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的。因此，在抓好党报编辑工作的同时，必须抓好党报发行工作。而营业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努力抓好《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

三、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及其营业部

在筹备创办《新华日报》时，中央决定组成党报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领导机构，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何凯丰、邓颖超、潘梓年等组成，陈绍禹任主席。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由周恩来继任主席。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这个委员会对外则称董事会。开始，由陈绍禹任董事长，1939年1月起，改由周恩来继任。

这个机构的设立，对《新华日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起着直接领导的作用。在它的领导下，制定了《新华日报》的章程。章程规定：董事会是报馆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一室三部，即经理室、编辑部、印刷部、营业部。

营业部下设发行课、图书课、广告课、事务课。在武汉时期，发行课设有日报股、周刊股、丛书股。在重庆时期，则设有本埠股、外埠股，还设有郊区发行股，沙坪坝区发行站、北碚发行站、歌乐山发行站。本埠股即城内发行股和郊区发行股均管理各自发行区内的报丁送报和报童卖报。

外埠股设有票签组（外埠订户及分销处的寄发报票签）和卷报房。

图书课设有门市部和邮购组。

四、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营业部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很少,以后才逐渐扩充起来。第一位部主任是寿松涛,不久,从湖北省委调来易吉光接任,直到1939年秋调回延安为止。工作人员有徐君曼、范剑涯、周迈前(1939年冬叛变)、朱端绶、吴组芳、钱锦汶、王树标、陆从道、许厚银、易竟成、李元清等10余人。其中,许、易、李3人只有十四五岁。对这些同志,又按发行、图书、广告三课安排工作。而发行人员占一半以上,有周迈前、朱端绶、何亮、陆从道、王树标、许厚银、易竟成等,周迈前任主任。

图书课主任是徐君曼,工作人员有钱锦汶等。

广告课只有主任范剑涯一人。

报纸在武汉市区的发行,是依靠报贩批去零售和供读者订阅,门市开始是零售报纸,发行课只派通讯员递送与报馆有关单位和国民党的主要军政机关。如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动员会、青年记者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等。

当时《新华日报》创刊号的第一版,发行课登了一则启事,征求基本订户1万户。不久,就有了武汉市的订户。由于报馆没有报差,就雇请其他报馆的报差兼送,而这些人成分复杂,工作不负责任,将发给他们的报纸和张贴的壁报,竟私自零售或卖给杂货店作包装纸用,有的还受特务指使,故意与报馆捣乱。读者订了报纸收不到报纸,严重影响了《新华日报》的声誉

和发行。种种情况表明,《新华日报》必须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1938年5月党中央长江局便从抗日训练班选送一批身强力壮的爱国青年,住进报馆担任报差任务,负责分送本市订户的报纸。

1938年5月以后,报馆建立了自己的发行队伍,他们是来自战区的难民青年,富有爱国热情和觉悟,能吃苦耐劳。订户虽然分布在汉口、武昌、汉阳等区域,但他们每天清晨便分路穿行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送报、贴报,让读者和广大群众每天早上能读到《新华日报》。报馆投送及时,随订随起,处处从方便读者出发,忠实为读者服务,所以本市订户很快增加起来,仅汉阳兵工厂的长期订户,5月底就发展60多户。

优待订户是一般报刊扩大发行采用的销售方法,《新华日报》将优待办法在报上做了扩大宣传。征求基本订户,报价每份每月0.80元,订阅5份者,赠送一份,订10份并送一处者,按批发计算。订阅《新华日报》的读者加订《群众》周刊,或已订《群众》周刊再订《新华日报》者,按订价八折优待。对于努力推销成绩显著的报贩,每月还可发给津贴费。对于经济困难的工人和学生个人订阅者,则按优待办法订阅。因此,扩大报纸发行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各地分馆分销处的建立及其发行网点

《新华日报》创刊后,就把建立分馆和分销处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当时,《新华日报》在山西太行、广州、重庆、

西安先后建立了分馆,并在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县、市建立分销处和代销处,这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发行网。发行范围逐步扩大了,发行量亦迅速增加。在国内,不仅是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省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而且发行到香港、澳门地区;在国外,发行到了苏联、英、法、美等国家及南洋各地。发行量在1938年5月以前,日销售量约1万多份,到7月份则突破2万份以上。武汉失守前一周,武汉三镇日发行量从3千份猛增到1万份。而它的读者则大大超过此数。因每一份报不只一个人看,常是许多人集体阅读或互相传阅。它之所以受广大读者欢迎,其原因是消息新鲜而丰富,内容充实,适应了广大市民的需要,更为重要的因素,日寇逼进武汉外围,其它各报都相继停刊撤退,只有《新华日报》坚持到最后,直到敌人进入市区的那天早上(10月25日),还出了报并发行出去后才撤退。

分销及发行网点如下:

山西太行分馆:负责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行,并秘密发行到敌占区去;

广州分馆:负责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区及香港、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发行;

西安分馆: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发行;

重庆分馆:负责西南各省区的发行。

武汉总馆:每天向上述各分馆航空寄去纸型,由当地翻印发行。一般情况,分馆在当天下午七八点钟可看到报。

这里着重谈一谈重庆分馆的设立和发展情况。重庆分馆

当时是考虑到武汉撤退后,作为总馆的格局来安排的。

中共中央长江局,鉴于重庆在抗战期中处于重要战略地区,又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故于1938年1月21日建立了重庆分馆,建立或租用印刷厂翻印发行《新华日报》,指定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具体组建重庆分馆。分馆于5月26日正式成立并开门营业。分馆经理由通讯处处长周怡兼任。具体负责翻印发行的是周守如、李思源和牟爱牧、向贤初等同志。

重庆分馆成立前,报纸每天由武汉邮寄重庆,要10天左右才能收到;成立以后,武汉每天航运纸型到重庆,随即翻印,重庆读者当天下午8点钟前后或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了。

据李思源回忆:每天下午4点钟,他就去珊瑚坝机场等候取纸型,取到后便直接送去白象街《新蜀报》印刷厂,浇铸锌版付印。7点钟前后就可发行了。当时,重庆市是通过派报业工会报贩发行的。该工会与地方帮会、哥老会及国民党特别组织均有关系。由于地下党事先作了疏通工作,又处于国共合作初期,去请他们销售《新华日报》时,未遇什么阻力,只嫌发行量少,不愿承头批销,报贩愿推销者可直接领取报纸去卖。以后不久,分馆招雇报丁胡少清、傅云清、夏万才等并开始预订,这才发展订户并向订户直接送报。

报纸纸型重庆分馆先是委托启明印刷厂翻印,不久又借用《新蜀报》印刷厂翻印。《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与我党关系密切,他曾在武汉与周恩来见面。其时,周向他谈《新华日报》将在重庆建立分馆,请他多方支持。他向周表示,当竭力帮助。

同时,在该报馆内,地下党的力量也较强,编辑漆鲁鱼、印刷工人杜延庆均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报馆内是很有影响的人,他们周围还团结了一批工人。所以,报纸的翻印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后来,西三街的《新渝报》社停刊,地下党同该报经理吴顺清商定,把这个厂房同设备买过来,并将工人接收过来。这样,西三街2号就成了《新华日报》的印刷厂了,由此并为《新华日报》重庆总馆打下了基础。1938年10月底,报馆从武汉撤退到重庆,这里就成为报馆编辑部和印刷部工作的地方了。

西安分馆的建立。由于国民党从多方面进行阻挠,因而到1938年8月才正式建立起来,还限于在市内和向延安发行,所以工作难以开展。

广州分馆1938年4月中旬建立,因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工作才刚开展,广州就于10月陷于敌手。进而迁至桂林,于12月11日开始翻印出版。1944年8月,桂林又被日寇侵占,分馆也随之撤销。

成都分销处是193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建立的。为扩大团结抗日的宣传,派罗世文(他是省委书记)领导,后又派曹雍在罗世文领导下,具体负责报纸推销业务。分销处设在祠堂街103号,在分销处(后改为营业分处)工作的同志,先后有于中、杨继干、洪希宗、申同和和潘建萍等。到九十月份,发行份数就增至1千多份,为成都和川西地区发行工作打开了局面。

自贡分销处建立以前,由一个报贩推销和代订《新华日报》,发行量仅20余份。1938年春,中央特派员罗世文从武汉经重庆到自贡市,指示中共自贡特委把党的机关报《新华日

报》的推销工作抓起来。于是,特委书记饶孟文将报纸推销工作交给抗敌救亡歌咏话剧团的副团长王志先负责。他与特委商量后,决定以战时书报流通处作为《新华日报》的代销点,门市部设在新桥半边街。1938年11月决定建立自贡分销处,由贾灵锋任分销处支部书记兼经理。自贡分销处在川南地区是较有影响的发行店。

贵阳分销处成立前,是由生活书店代销《新华日报》。1938年8月,由党派吴同尘同志先去生活书店代销处送报;10月,由他建立了分销处,日发行量有200多份。

以上是《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创刊到1938年10月下旬撤出武汉时期主要发行网点。还有许多县、市的分销、代销处就不一一叙述了。其中,如湖北宜昌,湖南长沙、衡阳,四川万县、泸州、内江、宜宾,江西九江、南昌等地均有销售网点。

至此,《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发行网点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当时,一家报馆在创刊后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这么多发行网点,确实是不容易的事。

六、扩大发行工作的重要举措—— 组织读者会

《新华日报》于1938年4月22日公告指出:本报组织读者会的性质和意义,是群众自由结合的学习组织,不是报馆附属组织,但可与报馆分销处建立密切的联系,人数多少不论,名称不强求统一,由读者会自行决定,任务就是组织读报、集

体讨论、写通讯报导、推销报纸等等,重点还在推销报纸,帮助发行。于是,各地党组织、分馆和分销处就对读者会的组织开始重视起来,先后在长沙、武汉、广州、成都、重庆、贵阳、广西、云南等省市建立了不少读者会。其形式多种多样,有叫读者会的,有叫读书会的,或叫时事座谈会的。目的是每送去一份报纸,就让他们既认真阅读又深入学习讨论,以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促进读者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少热血青年通过读者会的学习,在互相促进的基础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奔赴抗日前线,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如报馆营业部通过地下党关系,到国民党要害部门汉阳兵工厂,帮助那里的工人组织了读者会,吸收了一大批工人读报学习。他们非常积极,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努力生产,并参加救亡活动。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下令禁止读者会的活动,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他们,并逮捕了几个工人,他们只得秘密订阅《新华日报》。

又如罗戈东,当年在广州一个高中学校读书,他参加了广州分馆组织的读者会,并常和会员们讨论抗日救亡问题。1938年10月,日寇进逼广州时,他舍弃了富裕的家庭生活,奔赴重庆,于1939年9月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不少青年由于读《新华日报》而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进抗大、进陕北公学、边区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接受革命实践的洗礼。

读者会给报馆投寄稿件,提供新闻来源,以充实报纸内容,并介绍读者订阅报纸,组织人员分销,对扩大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约在1938年六七月后,读者会或读书会因国民党顽固派

进行迫害和取缔,遂由公开转为秘密,其形式则更是灵活多样。

七、重视《群众》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

在南京筹备创刊《新华日报》的同时,就考虑编辑出版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以便和《新华日报》共同开展团结抗日文化宣传和革命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1937年11月23日,潘梓年、徐迈进到达武汉,在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受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阻挠时,经潘梓年、华西国、许涤新、章汉夫、蔡馥生、徐迈进集体商议,并听取了一位关系密切的民主人士的建议,决定先办一个刊物,因刊物出版批准手续较报纸简便些,只需省党部宣传部门批准就行了。因之,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先于《新华日报》创刊问世。

《群众》周刊先由武昌印书馆代印,发行者为《群众》周刊社,读书出版社总经销,全国未沦陷的城市一些大书店经销。实际上,在武汉时期,《群众》周刊由《新华日报》营业部书刊股发行,从1938年12月25日第2卷第5期至1946年3月10日第11卷第3、4期合刊及1946年5月在上海出版第11卷第5期至1947年3月2日出版最后一期止,均是《新华日报》图书课发行,《群众》周刊在武汉、重庆、上海共出版14卷262期。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

刊物。历时9年多。这一卷卷、一期期的刊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过去是强大的思想武器,如今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群众》周刊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除了她是党的机关刊物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拥有一支既有思想文化又有科学素养的强大作者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经周恩来直接领导和精心培育的,并且他们曾经编过刊物,写过书,他们是潘梓年、章汉夫、吴克坚、许涤新、吴敏、石西民、戈宝权、胡绳、陈家康、戈茅、朱世纶、张謇。在重庆时期又增添了乔冠华(曾作三年的副主编)、张友渔、夏衍、林默涵、刘白羽、郑之东、熊复、周而复、刘光等。这支队伍常为《群众》周刊撰写社论、评论、专论、理论、学术研究、历史研究、文艺作品、影剧评论、诗歌和苏联及世界著名文学读物的评介。在社会上,也得到颇有学术成就的专家学者的积极支持,把他们在研究中已取得了精深成就的文稿送给《群众》周刊发表。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就是首先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很欣赏,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定把它列为党的整风文献之一。

为《群众》周刊写稿的还有陶行知、翦伯赞、侯外庐、张申府、老舍、薛暮桥、阳翰笙、范文澜、吴亮平、焦敏之、茅盾、周扬、袁水拍、秦牧、宋之的、赵树理、臧克家、艾青、陈荒煤、葛一虹、司马文森、邵荃麟、张庚、丁聪、刘清扬、柳亚子、艾思奇、马寅初、陈望道、马宗融、曹靖华、张默生、张志让、孔罗荪、陈白尘、罗烽、史良、邓初民、叶圣陶、王造时、吴晗、沈钧儒、黄炎

培、潘光旦等,还有中国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文艺等方面的专家,以及国民党内左派政治、军事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以及国际友人等。

由于《群众》周刊拥有这批第一流的作者,所以它内容丰富,理论性、学术性都较强,而且言人所不敢言,能对一些宣传封建思想和法西斯思想的错误东西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批判,从而能在国统区内出版达9年多,而且在1939年“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之后,各报暂停出版,只出10家报纸的联合版,到“八一三”《新华日报》单独出版前,它也未停止出版,并且在内容上还增加一周国内军事政治的综合报导,以及国际形势的概述。因此,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强大的生命力。

国民党顽固派对它进行了不断的摧残、迫害,特别对原稿的审查删改、扣压难以尽诉。要使它按期顺利出版,编者不得不殚精竭虑,绞尽脑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检查官进行常年累月的唇枪舌战,争取能按期出版发行。

由于《群众》周刊的进步性、革命性、学术性及其丰富多样的风格,所以《新华日报》营业部图书课一直把它作为重要发行工作来抓。国民党当局对它的外埠发行常常进行邮检或检扣、销毁或迫害订户。对此,营业部图书课就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邮寄办法,打乱其部署。市内除在《新华日报》门市发售外,还批发给二三十家进步书店发售,报丁报童在送报、卖报时也进行零售和订送。因此,《群众》周刊的发行量一直是相当稳定的,每期均在两万份以上。直到1947年3月后,国民党

发动全面内战,强迫中共人员撤退,才被迫停刊,迁到香港继续出版,至1949年10月结束,在香港出版了133期。在香港出版时,系通过秘密渠道发到内地,同时发到南洋和海外各地。

总之,《新华日报》营业部对《群众》周刊的发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群众》周刊在国统区坚持出版发行9年多,加上香港出版时间则为时更长。它在党的党报党刊出版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应彪炳史册。

八、《新华日报》早期的广告栏目

《新华日报》的经济来源十分困难,当时报馆的职工每月只发给最低津贴费以维持生活。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决定在报纸上以3/10的版面刊登广告增加收入。

《新华日报》广告工作进展较缓慢,因为在人们思想上,一是对共产党办的报纸心存疑虑,怕接触。这是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造成的恶劣影响。二是报纸刚创刊,在群众中的信誉尚未建立起来。人们要考虑刊登广告的效果,故不愿在《新华日报》这张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新华日报》刊登广告还有深一层的政治意义。总经理熊瑾玎说:“我们要开展业务,把报纸3/10的版面用来刊登广告。除了可增加报馆经济收入外,还能使我们在工商界和自由职业者中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还可向群众推荐革命的进步书刊,帮助读者选购自己喜爱的图书,促进文化学术及科

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所以《新华日报》开展广告业务,不是以金钱第一为出发点的。

《新华日报》刊登广告时是有自己的政治原则的。它在创刊一周后,就登出启事说:“本报秉巩固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之初衷而创立。出版以来,承蒙社会人士之赞助,本报感愧之余,益觉一文一字都应抗战而努力,都应有益于读者,职是之故,即广告一栏,亦拟严加选择。举凡违反社会进化规律,萎靡抗战情绪,提倡迷信及其它投机广告,恕不刊登。最受欢迎者厥为提倡国货,救亡文化及一切正当事业之开发,区区微忱,实根源于本报创业之宗旨,伏乞社会各界鉴察是幸。”这个启事,向社会各界明确宣告了《新华日报》刊登广告的原则。报纸创刊初期,某些人曾企图通过刊登广告来破坏报纸的声誉,欺骗群众,如要求报纸刊登刊物《血路》、《再生》两个反动刊物的出版发行广告,以及宣传唯心史观书刊的广告。由于我们坚持了上述原则,未给刊登。同时,对送来广告的人说:“如果《武汉日报》、《扫荡报》能刊登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抗战言论的书籍广告,我们就可以考虑登你们的广告,这样才叫对等嘛!”弄得这些人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在武汉时期,营业部没有广告课,无人专管广告业务,而是由发行课主任兼管,主要靠广告经纪人与其他报纸代拉广告。兼之,不少工商界人士怕在《新华日报》登广告,所以这时期的广告,主要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华中图书杂志公司、大众出版社、扬子江出版社、解放出版社以及本馆图书课的出版发行广告。其次是《全民周刊》、《中国农村》、《中苏文化》、《战斗旬刊》、《七月》、《新青年》、《战时乡村》、《半月文化》、《自

由中国》、《反攻》、《解放》、《群众》周刊等 20 种各类杂志的每期出版预告,以及医生、医药广告。如担任报馆医药顾问的宦世安医师在武汉报纸创刊不久,就主动上门要求登广告,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是要冒风险的。胡文虎、胡文豹的永安堂的万金油、八卦丹和永光明眼药水,都是在报纸创刊不久就与报纸发生了业务关系,而且长期维持,有的还一直延续到重庆。再次,就是少量的工商业广告,如鸿新染织厂、永新印刷厂、大都会餐厅、紫竹林食堂、南京新苏饭店等,再有武汉七家影剧院:中央、明星、光明、上海等,以上都是长期在《新华日报》刊登广告的。还有一些群众团体,以及八路军办事处有关启事和本报的新书出版发行广告等等。这些广告,有的收费不高,有的是减免,如全国慰劳总会和救济团体一类的广告等。

在武汉时期,就报馆领导意图说,是想开展广告业务的,但因客观上人们对《新华日报》不理解,有畏惧心理,政治上又受顽固派的歧视,凡属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有关的工商业,都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广告(这个局面在重庆出版中期才有所突破);同时,报纸处于初创时期,要办的事很多,武汉营业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又要筹划西迁重庆,而且当时业务人员有限,所以在营业部来说,广告业务的开展是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

九、《新群丛书》的出版发行

《新华日报》章程中规定,在营业部内设丛书股,成为公开

出版发售革命书籍的文化阵地,与早已成立的生活书店共同担负起革命图书出版发行的光荣职责。

当《新华日报》筹办时,党组织就决定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出版阵地,既出版发行报纸和《群众》周刊,又出版发行图书,以扩大宣传革命真理的作用。因参加编辑《新华日报》的人员中,不少就曾经在上海、北平等地编辑过革命书刊,有的还写过专著,理解出版发行革命书刊的重要意义。所以,1938 年 2 月 12 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丛书股就开始出版《新群丛书》。《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就此分别刊登广告启事:“为适应读者需要,除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所载之各种重要文章,陆续出版单行本外,并约请专家著译各种有助抗战知识之书籍,编为《新群丛书》。由《新华日报》发行。”在这天登出的广告中,预告有 6 种新书即将出版,营业部将有售,并欢迎各书店批发。其中有《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军队参谋工作》(苏联法尔佛默夫著)、《新华日报》社论第一集(以后每月出版一集)、《新华日报》专论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士兵读本》等,在武汉 9 个月,出版发行各种图书 40 余种。这些图书,除营业部门市发售外,还批发给武汉及全国分销处、代销处和进步书店。

十、既从容又繁忙筹划迁移重庆

徐州会战后,武汉成为日寇攻击的主要战略目标,武汉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周恩来早有预见和安排了。

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会见重庆《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时,就对将来迁渝的事,当面委托他到时给予多方支持,周也表示当努力支持。

迁重庆的具体安排,从6月份就开始了,决定分批撤离武汉。

第一批人员由总经理熊瑾玎率领,共23人,7月半启程,其中有杨慧琳、朱端绶、杨芳芸等,他们奉命到重庆筹建总馆。经过半个多月的逆水行舟,于8月1日平安到达重庆,住机房街(现民国路70号)八路军驻重庆通讯联络处,和通讯联络处处长和分馆经理周怡会合。

熊瑾玎一行在途中,到宜昌后,改坐帆船去万县,是逆水行舟,航速缓慢。熊瑾玎为缓解战友们在行船中急切心情,以丰富的文史知识,结合沿途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对同志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譬如船过秭归时,他就详细讲述屈原热爱祖国,备受奸佞谣言打击,而他九死不悔志行高洁的身世;到了香溪,就讲王昭君为了祖国安定和民族团结而远嫁异族,客死他乡的悲壮故事,还向同志们吟诵杜甫赞王昭君的七律诗和宋玉的《高唐赋》;讲述巫山神女峰种种美妙动人的传说、牛肝马肺峡的壁立千仞、势如刀削的峭壁悬崖和江中奔腾旋涡的险情,帮助大家增进大自然的知识,减轻沿途疲劳,缓解过险滩的惊惧心情。他还和船工拉家常,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触发其爱国之情,让他们更加注意安全,加速航行,熊瑾玎真是一位不放过一点机会向人民作政治宣传的革命者。

熊瑾玎一行到重庆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同周怡一道,开始紧张的筹备总馆迁渝的馆址、家具、印刷设备、向重庆市

政府申请变更登记、采购纸张、整顿分馆业务,以及照顾病号就医、安排家属生活等,真是千头万绪,忙不胜忙,何况不少事在别的单位做起来轻而易举,而在熊瑾玎他们则困难重重。因为重庆地方上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麻烦,干扰事务的正常进行,徒增了办事过程中意想不到的困难。但这一切都没有阻碍筹备工作紧张进行,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

第二批人员由吴敏(杨放之)、何云率领,有董谦、袁勃、张锷、范剑涯、史乃展、宗群等15人,去西安筹备《新华日报》西安版的工作。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军委会西北行营主任谷正鼎等,借口《新华日报》只能在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出版,不让出版西安版,因而何云、陈克寒、董谦等在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指示下,去了太行,进行筹划出版《新华日报》太行版,其余人员经吴敏向延安请示秦博古后,奔赴重庆参加筹备总馆的工作。

第三批人员由徐光霄(戈茅)、华西园(华岗)、易吉光率领30余人,于8月上旬由武汉乘两艘木帆船而上。船上还装有为开印刷机、排字用的零部件、百余卷筒新闻纸,约计26吨物资。其时,长江江面上既有军舰,又有商轮和木船,航行秩序比较混乱,为了沿途行驶安全起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了两名有战斗经验的红军老战士护航,并对此行发了十八集团军军用船的护照,在船头上竖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大军旗,徐光霄身着军装并佩戴着上校军衔的徽章。沿途军警不知道十八集团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看到军旗和立于船头气势昂然的徐光霄上校军官,既不敢阻扰,也不

进行“检查”(实即勒索钱财),恭敬让路放行。木船逆流而上,一天能行驶15余公里的水路。开始两天,报馆与船工都有些拘束,但同志们善于做群众工作,又有旺盛的革命精神,一路上,白天帮船工摇橹张帆,晚上同他们讲共产党的救国主张,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也讲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横行暴敛、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种种暴行,与船工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生活上打成一片,谈笑自如,有如一家人。

动身前,在武汉组织了行军支部,华西园任支部书记,徐光霄任副书记。行船途中,支部抓紧时机对同志们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由华西园讲中共党史、国内政治形势及国际共运史。他是老党员,斗争经验丰富,对党史、重大革命斗争事件、国际共运史都颇有研究。他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内容,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启迪和激励大家不断学习,努力奋进。革命老人蔡疾呼同志也向大家讲他在法庭上对敌斗争的情况,向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晚上,在船靠岸后,就组织同志们上岸,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唱抗日歌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38年初一,船行至宜昌。报馆党支部书记、营业部主任易吉光已先到这里,他登船传达长江局的指示,“武汉不久将陷落敌手,要加紧准备《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事宜。”长江局还命令华西园率领一部分同志先行,尽快赶到重庆。于是,华西园、王召先、沃静霞、郭奎、易吉光等就改乘轮船进川去重庆。

木船队由徐光霄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继续溯江而上,历险滩、经急流、穿三峡,在11月26日行至丰都高家镇时,一木

船不幸搁浅,船破不能航行了。在徐光霄指挥下,组织大家和岸上群众,经过几小时的奋战,将船上的机器、纸张和其他物资抢救上岸,并电告重庆求援。

重庆总馆接电后,即派宗群前去抢救,徐光霄等于1月14日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经过5个多月的长途航行,胜利地完成从武汉撤到重庆的任务。同志们虽经千难万险,但仍精神振奋,因自己为《新华日报》正式在重庆出版作出了贡献而兴奋异常,激动不已。

十一、血染长江的悲壮史——新升降事件

1938年10月上旬,日寇已逼进武汉市郊,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向鄂东南和鄂西北作战略转移。这时,武汉全市疏散撤退工作极为紧张。周恩来对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第四批撤退工作极为重视,指示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社长潘梓年率领大部分人员,于10月22日清晨撤出武汉,承租用悬挂荷兰国旗的“新升降”号轮船,装运大部分物资西去重庆。

李克农、潘梓年率队于22日清晨离开武汉时,周恩来、吴克坚、陈家康等亲临码头送行。他们谆谆叮咛李、潘等人,沿途要注意安全,安排好船员和同志们的生活和学习。

这时,日寇已水陆两路包围武汉,又极力破坏后方交通,派飞机严密控制城陵矶一带的江面,轮番轰炸沿江西行的轮船和木船。

10月23日晨,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洪泽湖市)。李克农、潘梓年分别向船上的同志们和难民们作了说明,为防范敌机的袭击轰炸,保证大家途中安全,决定白天轮船靠岸停泊,晚上航行,船上除留值班的人外,其余都下船去附近农村躲避空袭,还要利用一切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向农民讲述坚持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道理。

10月23日下午3点半,预定回船登轮的时间到了,同志们纷纷陆续上船,忽有4架敌机飞来,并向轮船投弹,顿时,船被炸进水,继以又被敌机枪扫射达半小时之久,办事处和报馆共28人遇难。其中,编辑部有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等8人;印刷部有李鉴秋、罗仁贵、王祖国等4人;经理部有罗广跃、潘香如、李履英等3人;营业部有陆从道、许厚银、李元清、易竟成等4人;八路军办事处遇难的有张海、伍高年、韩金山等9人。同时遇难的还有船员和难民50余人。

这些同志不论年岁高低,他们都是民族危亡的时候,怀着救亡图存的志愿,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的。其中,潘美年(潘梓年之弟)、项泰(胡绳之姐)、李密林等3同志在敌机轰炸扫射时,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抢救别的同志和难民,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表现了舍己救人的英雄气概。这也是“新华精神”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现。

这笔血债使《新华日报》活着的同志们更加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只有争取最后胜利,才能讨回这笔血债。

在潘梓年、徐迈进、汤宝桐率领下,脱险的同志们继续乘木船于11月5日抵宜昌。他们在沿途受到《新华日报》的读

者、武汉大学的学生王家母子、洪湖老苏区的渔民以及从武汉迁来烽火镇(今洪湖县)的中学师生的照顾。当这些群众得知是八路军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遇难后,都十分热情地留宿供饭,学校老师、镇上负责人和群众代表还设宴欢迎,表示亲切慰问,并送了20多床棉被给同志们沿途御寒,给脱险同志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这是老苏区群众深切怀念洪湖赤卫队领导他们向反动派开展殊死搏斗的历史情景,向共产党表示的亲密革命感情,也是革命种子发芽开花。

脱险的同志分三批从宜昌向重庆进发。潘梓年是第三批于11月23日抵达重庆的。

潘梓年抵渝后,不顾旅途劳累,当天晚上就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举行记者联谊会,邀请重庆各报、各通讯社、外地驻渝记者以及苏联、美、英、法等外国记者数十人参加。他怀着满腔义愤,详细介绍了报馆从武汉撤退途中在湖北燕子窝遭遇敌机轰炸扫射的悲惨情景,对日寇暴行作了无情揭露,还介绍了本报编辑、记者和经理部、营业部、印刷部遇难的16位同志,介绍他们在创办报纸过程中的勤奋工作精神,在遇险时忘我的牺牲精神,称颂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譬如项泰、潘美年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地组织大家跳入长江,争取尽快脱离险区的悲壮豪情。这些同志最大的才30多岁,最小的才14岁,他们都立志要为中国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伟大事业而献身,是《新华日报》馆战斗队伍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新华军”战士。

重庆总馆总经理熊瑾玎等满怀悲愤的心情,一面连续在